

肖遥专栏 艺术狂人

石头的脆弱

卡蜜儿的故事若被演绎,可以很狗血;大师始乱终弃、痴女半世疯癫;也可以很文艺:人间自是有情痴,此事不关风和月……但卡蜜儿遇到罗丹,本质上是一场成王败寇的故事。卡蜜儿和罗丹在一起后,罗丹爆发了强大的创造力,由能量互动的原理来解释,卡蜜儿滋润了罗丹,但罗丹没有浇灌卡蜜儿,罗丹爱她的躯体,而不给她名分,爱她的才华,却不让她独立创作,卡蜜儿一生的光彩,都掩映在“罗丹的情人”的阴影之下。

不甘心被罗丹光环淹没的卡蜜儿后来成立了工作室和罗丹分庭抗礼,她化怨恨为力量发奋创作,可怕的是她的对手是大师罗丹,有人甚至说她的创作是抄袭罗丹,没人计较罗丹利用了卡蜜儿多少灵感和创意。话语权力属于罗丹这样的世所公认伟大的艺术家,但是罗丹选择了缄默,没有出面澄清舆论对卡蜜儿的诬陷,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,如果放在现代,卡蜜儿和罗丹分手的官司不仅要涉及青春损失费、情感伤害费,恐怕还得包括知识产权的分割。

周松芳专栏 民国衣冠

美术家时代的时装

无论时装表演或者服装表演,均表明中国已经进入服装时尚的大众化时代。第一次时装表演中,干夫人开宗明义地提出时装表演的首要目的是寓美术教育于游戏,其次则是表现服装料作之如何可以充分利用,否则“世有华丽绝伦之绸缎,及制成服装,不仅减损美观,且予人以笑柄”(《申报》1926年12月14日《联青社游艺会预志:最出色之一种游艺——时装表演》)。这干夫人确实有乃父唐绍仪的风范,一语点破。事实证明其所言不虚,稍后的时装界,几无不以“美术”相号召。

在时装初起的年代,往往是先有图画刊登于杂志,等有读者看中了才能成为服装。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,对此应当深有体会。只是后来的画家们,对此多已不屑一顾,所以那一段时光,更值得珍藏了。当时许多画家兼时装设计师皆是画坛名宿,如叶浅予、张乐平、梁白波、李珊菲、方雪鹑、何志贞、但杜宇和万古蟾、万籟鸣、万涤寰、万超尘四兄弟等,叶浅予、张乐平等,均是后来的画坛宗师,因此,他们当年的时装绘画之举,就成为不可多得的逸事了。

较早涉足时装绘画的画家是但杜宇。1920年《时报》增发图画周刊,开辟“新妆图说”,由但杜宇逐期编绘。但氏以画仕女月份牌闻名沪上,早在1919年即有中国第一部个人漫画集《国耻画谱》,后来成为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。在那个年代,时装基本处于舶

也许卡蜜儿的不幸是因为她做了雕塑家,她用雕刻刀对付作品和人生,下手果断毫无迂回。她的个性也像石头一样刚硬,对情感义无反顾,对生活不肯退而求其次,在感情博弈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自尊太强的人不是不会、是不愿用以柔克刚,乃至以卵击石自取其辱,或者以石击石两败俱伤。然而玉石俱焚不过是另外一种脆弱,卡蜜儿始终不愿意明白,自己的喜怒哀乐、嗔痴怨怒对于不再疼惜她的人都是“俏眉眼做给瞎子看”。

据说“只有偏执狂才能胜利”,但情感偏执狂除外,和卡蜜儿一脉相承的古希腊复仇怨妇美狄亚,还有中了情花之毒的李莫愁,都不惜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怨恨中去。

可以想象,放在现代,目光炯炯的卡蜜儿每天都坐在罗丹家门口等他到天亮,或者蓬头乱发的卡蜜儿半夜三更在歌厅、洗浴广场挨家挨户找她的罗丹……和疯狂的卡蜜儿狭路相逢的罗丹,会不会后悔没躲厕所里、马桶里,恨不得让下水冲走……

来阶段,但杜宇的工作,需要创意,于中国时装发展功不可没。嗣后,各报刊就纷纷开辟专栏,邀约画家创绘新妆。如张爱玲所说上海滩几人手一册的《玲珑》杂志,邀约的是大画家叶浅予,天津《北洋画报》邀约的是李珊菲。尤其是《北洋画报》,身处北方的天津,读者反响更强烈,有人致函编辑说:“妇女莫不着意其服装之时髦及美丽,但花样日有翻新,不能独出心裁者,每苦瞠乎人后。今贵报提倡新装,令人有所取法,殊足为交际社会之明灯,惟希继续刊登,弗使间断。”该报也就顺势加大服装美术的力度,“特约名画家曹涵美君绘‘美的装束’即将制版刊出”。(《北洋画报》1929年第330期记者《美的装束》)

风气之下,连专业的绘画杂志也开辟时装绘画专区。如《上海漫画》创刊号即以“新装画”相招徕:“行将出世之五彩《上海漫画》系由漫画会员王敦庆、黄文农、叶浅予集合文艺界同志如丁悚、张光宇、王启煦、季赞育、陈秋草、方雪鹑等执笔编辑。其第一期内容有叶浅予之大小标准及新装画……”(《申报》1927年12月30日《上海漫画定期出版》)更专业的《美术杂志》也为方雪鹑开辟了新装专栏。

抚今追昔,现在的画家们,穿着打扮往往突出,学服装设计的往往要具备美术功底,但两者却走着不同的路,何时能再度珠联璧合一回呢?

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栏杆拍遍

我想,栏杆应该是中国人最优雅的发明之一。

有了栏杆,也就有了种种复杂的思绪。从美学的角度来讲,栏杆起到的作用,是把无限的天地分隔成有限的空间。这种分隔的活动,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人们,私处也是一门艺术。当一个古代的帅哥在秋天的早晨站在露台上眺望远方,栏杆之内的,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怅惘。

栏杆这种设计方式,与冷冰冰的厚墙有天壤之别。一堵墙留给人的是绝望,而一溜栏杆留给人的是诗意。这是一种分割时间与分隔空间的艺术。这种设施的妙处,在于你可以轻巧地跨越它、绕过它,只要你愿意。这里暗示的,是一种古典式的自由哲学之所在。

史杰鹏专栏 大放绝句

汉武帝为什么要折腾百姓?

《国语》里面,公父文伯的老妈说:“昔圣王之处民也,择瘠土而处之,劳其民而用之,故长王天下。夫民,劳则思,思则善心生。逸则淫,淫则忘善,忘善则恶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,逸也。”

她的意思是,早先伟大的王安置百姓,总选择最贫瘠的土地,逼他们干活,不让他们有喘息之机,所以长治久安。老百姓累了就多思虑,多思虑就善良。不累就淫逸,淫逸就凶狠。肥沃的土地,产生不了像样的人才,就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。

苦难是一所大学。但这不是抒情,而是谈统治术。在专制社会,要想政权稳定,老百姓饿死不行,但吃香喝辣也不行。一定要适时折腾,不让他们有闲钱,这样的统治是最牢靠的。

余斌专栏 东鳞西爪

蒋介石的婚启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,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步入婚姻殿堂。“步入……殿堂”之类,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,对他们二人的婚礼而言,却也是写实,因婚礼虽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与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,却都是西式的,浪漫而庄严。一个已是民国的头号人物,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,想不隆重都不行。

这桩婚事之庄重,也见于二人的婚启:当天,上海《申报》刊登蒋介石的《我们的今日》,文中有云:“余二人此次结婚,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、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,实所大愿。余二人今日,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,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,余必本此志愿,努力不懈,务完成中国革命而后已,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,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,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,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,而宋女士亦尝矢

这种有效提醒却分明不是凭借厚重的砖石所造成的效果,非常符合中国的含蓄美。而含蓄,是一种高智商的审美活动。

至少在唐宋时期,栏杆就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对象。温庭筠写道:“春水渡溪桥,凭栏魂欲销。”——凭栏为何销魂?这是从字面上所领悟不到的。但我想,那大约是一种取舍自由的理想状态吧。温是晚唐人,早年进入宰相令狐绹的书馆里工作。一次,令狐宰相看中了温庭筠的一首《菩萨蛮》,就假托是自己所作,献给了当时的皇帝。让人没想到的是,温庭筠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。原因,自然是看不起这种卑鄙的伎俩。这件事情之后,他被宰相老爷修理多次,并最终因歌直而落魄江湖。

汉武帝就很爱折腾,打匈奴,搞礼乐,灭南越,开西南夷,让天下人口很快减少一半。不断立法,让大富豪财富缩水,中产之家破产。但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些,只看到了武帝的文治武功。他们说,匈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,没有伟大的汉武帝,民族不能独立,人民站不起来。但武帝一定会心中暗笑,我有那么伟大?要勤学多思啊。

我来带大家思考吧。武帝曾对卫青说:“汉家庶事草创,加四夷侵袭中国,朕不变更制度,后世无法。不出师征伐,天下不安。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,是袭亡秦之迹也。”

这段话其实很值得玩味,“汉家庶事草创”,意思是汉朝的基本制度还不牢固,还要加强皇帝

——性格决定命运。文人的歌直给自己带来的,必然是一再碰壁。即使他在文学史上赫赫有名,在现实的角落里仍然会头破血流。

一般而言,男子凭栏,女子倚楼。辛弃疾和岳飞将栏杆当作啸傲天下、抒发豪情壮志的突破口,温庭筠们则将其视作猎艳的绝佳场合。至于古代的女子们,每每登上高楼。她们的情人或丈夫,要么在远方戍边、建功立业,要么外出经商,音信全无。

传统上,西人为追求自由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,国人则贪图苟活,“好死不如赖活着”。这中间观念上的差异之大,论原因,我这个书呆子实在不会分析。但是,国人在心灵上又讲究追求超然物外的自由。真是让人感慨万分。

的领导;“四夷侵袭中国”,胡扯,除了匈奴经常来抢点东西,其他三边都是你去侵略别人好吧。“朕不变更制度,后世无法”,不在我活着的时候把不稳定因素消除,先烈打下的江山会易手啊。“不出师征伐,天下不安”,要反着听。正是因为屡次出师征伐,闹得天下骚动不安,而不是相反。“为此者不得不劳民”,其实是说,富人必须穷下去,中产阶级必须没闲空得瑟,穷人必须挣扎在贫困线上。最后一句意为:当然不能搞过火,老百姓没饭吃也不行。

好吧。我的意思是:在武帝看来,文景之治的成果,让百姓过得太舒服了,搞点战争,折腾折腾老百姓,是有利于统治的。这和《国语》所言,是一脉相承的。

言,非得蒋某为夫,宁终身不嫁。余二人神圣之结合,实非寻常可比。”于此二人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男一见倾心,宋女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,“今日之结婚,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”云云,则又依稀是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变奏,总之革命加恋爱,其“神圣”似不言而喻。

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,也无结婚登记一说,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,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一结婚启事,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。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告示,如同一则广告,自然可大可小,内容则悉听尊便。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,他的《我们的今日》登在显著位置,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,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,我们正不妨以婚启视之,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。

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,小民百

姓是否肃然以对,就非他所能控制了。事实上,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,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,而八卦对“神圣”注定是消解性的。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,在百姓的眼中,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,——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: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,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,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?很不幸,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,蒋大有被填入“惧内”故事的趋势。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,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。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,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: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,令蒋尴尬,如何与蒋置气,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,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掷将过来……有真有假,总之,他搞不掂她。